

机关不能养“懒人”

秦丹



今日论语

在春节长假后的第三个工作日,央视记者走访了安徽、天津、呼和浩特等地的行政单位,发现各地上班有点“松”:签到表上有局长“提前”一周签到,服务大厅十余个窗口空无一人,街道办工作人员上班“煲电话粥”甚或睡觉,上班时间办事大厅已大门紧锁……

春节长假后,谁来“收骨头”?

局长这个层面的领导干部都松松垮垮,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状态,可以想象。中央针对领导干部的一系列禁令以及“反四风”活动,直接促成了各地公务人员生活方式的改变,送礼收礼的少了,公吃公喝的少了,浊气清了,这是好的

方面。但在禁令下夹着尾巴“做官”,并不代表从内心深处发生了“化学变化”,假如领导干部连上班人都不到,管理怎么可能加强,工作人员又怎么可能规规矩矩地为人民服务?

由此,群众进门办事怎么会不难?假如公务人员可以这样逍遥过日子,那老百姓催一催,甚至问一问,都可能让他们觉得“麻烦”,弄得无名火起!媒体报道过的“大爷脸”、“小姐脾气”多着去了。

政府机关不能养“懒人”,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可以这样“无功受禄”,还因为他们浪费了行政资源,会耽误群众办大小事情。政府机关“转不动”,一个社会的效率必然低下。一个低效的政府,公信力就会受到影响。

这些年,我们的社会发展得

快,生出来的事情也多。不少政府部门人手不够使,于是名正言顺地向社会购买服务。但与此同时,对服务质量,却监管不够,甚至一个项目还可能被“转包几手”,经手之间,层层剥皮,颇可谋利。事情包出去了,还找了不少的社会帮手,于是不少明码正编的公务人员,变成了“爷”。爷当久了,事实上就是“懒汉”一条。不做事,不管事,出了事,就推给“临时工”。

事实上,一些管理发达的国家,很懂得向社会购买服务。我们的社会跟人家相比,孩子多、老人多,困难群体多,需要的公务人员和“临时工”何止目前这个数。人家的孩子遭遇家暴,马上有人来帮助,后续的服务一应俱全,靠什么呀?靠人!我们的国家不缺人力资源,但若不尝试

各种好的管理机制,公务人员越多,跟“公”沾亲带故的越多,就“懒人”越多,服务型政府就越难实现。

就在近日,财政部发出通知,要求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,从部门预算经费或经批准的专项资金等既有预算中统筹安排。当然希望这一纸通知能落到实处,但还要考核预算资金有效使用的情况,否则用出去的钱是少了,但民生工程也“缩水”了,倒霉的是群众。

不是公家人,莫进公家门。公家人,先要有一颗讲服务、讲奉献的公心。恪尽职守,遵规守纪,主动工作,在其位谋其政,不要懒政要善政,这样才对得起人民群众的托付和供养,也才对得起岗位承载的神圣使命。



新民随笔

情人节和元宵节同时掉河里了

明天是情人节,又是元宵节。

元宵节是地道的中国传统节日,情人节是西方传来的节日。

元宵节是家里人团聚的节日。情人节是情人团聚的节日,双方可能是家里人,也可能不是。于是,有的人就面临究竟选择过元宵节还是过情人节的纠结。这种纠结如同被问母亲和爱人掉到河里你救谁一样。

最纠结的还不是情人们,而是有的商家。情人节在中国已被异化为商家的狂欢节。商人们为什么对情人节情有独钟,大加煽情?情人节商机多嘛。元宵节家人吃碗元宵,有多少生意好做。

其实元宵节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古人的情人节。元宵灯市,是男女社交、约会的好时机。这下好了,中西情人节交汇在同一天,商家更该做文章了。

西方情人节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,其中听上去比较靠谱的我觉得是:公元3世纪,罗马帝国皇帝克劳迪乌斯二世宣布废除人们所有的婚姻承诺,目的是让更多男人上战场。一名叫瓦伦廷(Sanctus Valentinus)的神父抗旨继续为相爱的年轻人举行教堂婚礼。瓦伦廷神父因此被告发,受尽酷刑,并于公元270年2月14日被绞死。西方人为纪念这位神父,将这天定为Valentine's Day。这个神圣的节日,被翻译到中国,成了“情人节”。

中国的元宵节也有许多与情相关的故事。说一个喜庆的:王安石20岁时赴京赶考,元宵节路过某地灯市,遇一大户征联招亲,联曰:“走马灯,灯走马,灯熄马停步。”王安石怎么都想不出下联。不料到了京城,主考官也考对子:“飞虎旗,旗飞虎,旗卷虎藏身。”王安石即以招亲联应之。高中进士的他归乡又路过招亲人家,只见招亲联仍无人对出,遂以主考官的出联应征,被招东床。这真是金榜题名兼洞房花烛,人走运了走路都有土地公公托着脚。

好了,过了元宵节,这春节算是过完了,大家该干嘛干嘛。但情人节过了,情却不要仅有这一朝一幕。借此预祝明天有情人们皆大欢喜,皆成善缘!

林明杰

个人努力如何突破“关系重围”

权威声音

春节过后,一个段子在微博上流传,“未来几天,又将是秀兰、翠花、桂芳、大强、二饼、狗剩们陆续续变回Linda、Mary、Vivian、George、Michael、Justin的时候了”。

一方面是大城市的人才高消费,一方面却是中小城市的人才紧缺。年轻人“折返跑”的背后,有着种种无奈;而中小城市人才只出不进、多出少进的现状,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法学家梅因有个名言:进步社会的运动,是一个从“身份到契约”的过程。北上广处于中国现代化最前沿,经济发达、国际化程度高,基本上是“陌生人社会”,人情、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,个人能力的重要程度提升了,没有关系的年轻人也可以找到晋身之阶。相形之下,现代化水平不高、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小城市,资源更多集中在政府手中,“关系”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。

在这个意义上,与中小城市相比,大城市的优势不只是高楼大厦,更在于相对公平的契约关系。反过来讲,提升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,除了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,更重要的是规范分配规则、营造公平环境,用法治思维、规则意识取代地域情结、人情关系。一方面,从市场

经济秩序着手,真正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,构建全面开放、自由竞争的就业环境;另一方面,从社会法治秩序着手,加快转变

政府职能,进一步简政放权,从源头上治理“拼爹”背后的“拼权”现象。

(人民日报评论部 刊今日《人民日报》本报有删节)



元宵灯谜——这马是跳是跑还是趴?

马年春节,一线城市楼市进入「休眠期,然而土地市场却逆势走高,呈现出「楼冷地热」的特点。

天呈画

新民新语

犯错误

徐轶汝

这两天,一段7分多钟的“央视直播失误集锦”视频在网上疯传,网友看了之后直呼笑得根本停不下来。视频中,白岩松、李瑞英、董倩、赵普、李梓萌统统有份,主播们因为紧张导致的口误一个接一个,甚至把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错念成奥巴马;记者和专家因为直播连线太紧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羞愧地低下了头;还有导演失误导致空场,只见主持人默默整理着桌上的稿件。

令人意外的是,与近期央视在微博上多被吐槽的情况不同,网友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,主持人平时压力大,出点错很正常,这样反而显得更“接地气”;还有人担心因为播出事故,主持人、导播会被扣工资,默默为他们掬一把同情泪。

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央视主持人这样的业界精英,也有状态不佳的时候。宽容别人犯的错误,这是处世的经验,待人的艺术,为人的胸怀。但是,央视的这根“小辫子”,并不应轻易“放过”。出现低级失误,一次两次还好,如果频率很高,恐怕就不是低级错误那么简单,网友也不会那么宽容以待了。客人之过,目的是给别人改正错误的机会。错误是真理的邻居,犯了错误自觉改正,个体才会不断发展进步。

回想当记者的最初几年,我也曾犯过低级错误,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报道中写上“宝山区宝山路”。当天下午,读者热线就不断接到市民来电指正错误,我自己则惴惴不安了一整天,觉得还在见习期的自己下一秒就要被调离采编一线了。最后么,被小惩大诫扣了50元工资。现在我还常常抓住自己的“小辫子”,提醒自己不能马虎大意。

同样,央视的主播、导播们在直播结束后,肯定也在反思错误发生的原因,研究解决的方法,确保今后类似的失误不再出现。所以,偶尔抓住“小辫子”不放,并不是为了攻击别人,而是我们需要以此来警醒自己。

容人之过,也要有底线,在一些原则性、根本性的问题上不能让步,不能“顺人之非”。

自由谭

昨日新民晚报评论版刊登了谢京辉先生的文章《“居民食堂”的感悟》,吐露了对50年前里弄食堂的怀念。在“居民食堂”里,青菜大排1毛5、干煎带鱼1毛,青菜5分,价廉物美,回味无穷。文中说到,现在已步入老龄化社会,许多老人为“一日三餐”犯愁,呼吁再度开办“居民食堂”,以造福广大老人。

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,对“居民食堂”也有印象。在80年代初,外婆也曾从虹口区的里弄食堂打来饭菜给我吃,红烧肉味道确实不错。然而,那个时代的“居民食堂”能否再度回来,却难有肯定的答案。

首先,要从“居民食堂”产生的时代谈起。谢文也说到,“居民食堂”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。当时,上海可以吃饭的地方很少,除了数得出的几家饭店外,就是小饮食店。那时,外面供

从“居民食堂”说到“老年食堂”

邵宁

应再紧张,“居民食堂”也能获得政府调拨的副食品,再请一些家庭妇女出来帮忙,只需支付她们很少的补贴即可。由于成本很低,或者说不计成本,因此早、中、晚都能供应。

如今,早已进入市场经济时代,政府大包大揽已成过去式,要开办一家食堂,不得不考虑人力成本、房租、水电煤等问题。现在,聘请一名厨师工资至少四五千元,服务人员至少2000元,还不算“四金”,如果加上房租,还要早、中、晚都供应,菜肴的价格就不可能太便宜。而同样的价格,遍布大街小巷的点心店、拉面馆、茶餐厅,也可以吃到各种口味的饭菜。所以,希望那种全天候、价格极低的“居民食堂”再回到身边,是不现实的,也是不必要的。

第二,来看看老人的吃饭问题。今天尽管没有了“居民食堂”,但“老年食堂”出现了。谢文写道:“虽然有关部门在积极解决老人的困难,办起了托老所、老龄送餐服务,但有严格的年龄限制,菜的质量还有待提高。”我在社区采访多年,知道各县、街道、镇近年来都非常重视老人助餐点的建设,想方设法腾出场地,开办老人助餐点,还给予员工工资、水电煤补贴,确保老人支付的七八元餐费,全部吃到肚子里。

我实地走访过许多托老所、助餐点,似乎并没有年龄限制。60岁以上老人都可前去就餐,一月一订,如果60岁以下的居民有需求,也可以吃。而且只要老人提出,助餐点都可以送餐上门,有的社区还免费送。困难老

人还能享受到餐费减免,这也是合理的。助餐点不可能每个居委会都开一个,因为成本太高,但有的社区会将饭菜送到居委会,让老人就近用餐。当然,老人助餐服务还未做到尽善尽美,饭菜也是众口难调,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老人的吃饭难。

最后,还想说说老人们对于“居民食堂”菜肴滋味的幸福回忆。其实,这种味道,是数十年过后,沉淀在记忆中的、经过美化了的味道,甚至夹杂着对逝去的青春岁月的怀念。另外,50年前的中国,物资紧缺,食物匮乏,人们吃什么都香,相比之下,现在大鱼大肉、龙虾海参摆在面前,也觉得没啥好吃的。

许多美好的东西确实让人怀念,但逝去了,就不妨让它留在记忆中也。